

一枝红杏

徐建融

应怜屐齿印苍苔，
小扣柴扉久不开；
春色满园关不住，
一枝红杏出墙来。

叶绍翁的这首《游园不值》，千百年来脍炙人口，传诵不衰。叶本是一个小诗人，但这首诗却大大的有名，就像张择端在宋代的画史典籍中名不见经传，但他的《清明上河图》却是中国美术史上最经典的作品一样。关于叶，我们只知道他是南宋中后期人，出生并生活在今浙江丽水的龙泉，终身未仕；也有的记载说他元初还在世。为“江湖派”诗人之一，擅长七言绝句。但这个“江湖派”不同于“江西派”，它并不是一个有学统关系的诗派，只是因为当时有一批诗人，包括罗与之、许棐等，互相之间虽然几乎没有关联，但都是处江湖之远的隐逸之士，诗风又相接近故名之。而叶所“擅长”的七绝，真正有所“长”且广为人们知的，事实上也只有这一首；其他的数十首，实在并无太大“长”之处。

然而，由于这一首的出名，叶绍翁也“人以诗传”，由一个“小诗人”变成了大名人。在他的家乡龙泉，还专门为他建造了纪念馆，作为当地发展文化旅游业，吸引四方游客来此观光的一个人文景点。大约六七年前，我在杨尔教授和龙泉夏局长的陪同下，也曾前往参观过。园林的建设，大致仿照诗意经营匠心，虽然没有宝剑、青瓷的感人至深，也算得是为饕餮大餐开胃的一碟小菜。

杏花栽植培育，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早在三代便已十分普遍了。《礼·内则》：“桃李梅杏。”《管子·地员》：“五沃之土……其梅其杏，其桃其李。”作为蔷薇科的赏花时又是食果之树，赏其花则称“杏花”，食其果则称“杏子”，主要盛产于北方。南方虽亦有种植，但规模不大，一般种在园林庭院中，主要用作观赏。

由于种植的历史悠久且遍布南北，所以，自古至今，以杏花为题材的诗词非常之多，但最出名的则仅有两首。其一，自然是叶绍翁的那一首，尤其是“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这两句。其二则是北宋宋祁的《玉楼春·春景》词：

东城渐觉风光好，
颺皱波皱欲迎客；
绿杨烟外晓寒轻，
红杏枝头春意闹。

浮生生长恨秋少，
肯爱千金轻一笑；
为君持酒劝斜阳，
且向花间留晚照。

尤其是“红杏枝头春意闹”这一句。宋祁是仁宗朝的翰林学士，曾与欧阳修同修《新唐书》，本就是一位身份显赫的大名人；但这首词尤其是这一句更为他锦上添花，一时有了“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的美誉。令人不解的是，历史上的“宋词选”，一般都不会不选这一首的，近世俞陛云(1868—1950)的《唐五代两宋词选释》却没有选宋祁，当然也不可能有一首。

所谓“树大招风”，名人、名诗、名句，在大多数人作为崇拜的对象，五体投地地“见贤思齐”；但在某些好“相轻”的“文人”，往往表现为不服气，并以此作为怀疑并找茬抨击的标的，有意地弄出许多是非来。“红杏闹春”、“红杏出

墙”出个大名，在众所艳羡的同时，自然也不少了持非议之人。俞先生的不选宋祁，或许正表示了他的不满；此外更有人认为“闹”字根本就用得不通的！对这一是非，钱锺书先生在《通感》一文中已经作了全面的评点分析，至矣尽矣，蔑有加矣！关于“红杏出墙”的是非，钱先生在《宋诗选注》中也作了精彩的评点分析，大体上已经充分，但窃以为还可以略作补充和引申。

先来看钱先生的评析：
(此诗)其实脱胎于陆游《剑南诗稿》卷十八《马上作》：“……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出墙头。”不过第三句写得比陆游的新警。《南宋群贤小集》第十册另有一位“江湖派”诗人张炎写的《雪窗小集》，里面的《偶题》说：“……一段好春藏不尽，粉墙斜露杏花梢。”第三句有闲字填衬，也不及叶绍翁的来得具体。但这种景色，唐人也曾描写，例如温庭筠的《杏花》：“香艳艳歌春日午，出墙何处隔朱门”；吴融《途中见杏花》：“一枝红杏出墙头，墙外行人正独愁”；又《杏花》：“独照影时临水畔，最含情处出墙头”；李建勋《梅花寄所亲》：“云鬟自粘飘粉，玉鞭谁指出墙枝。”但或则和其他的情景掺杂排列，或则没有安放在一篇中留下印象最深的地位，都不及宋人写得这样醒目。

“红杏出墙”的蓝本，如上所述之外，我们还可以举出不少。如王禹偁的“日暮墙头试回首，不施朱粉遇东邻”；王安石的“独有杏花如唤客，倚墙斜日数枝红”；范成大的“浩荡春风无两岸，如何锁得杏园春”……词则有高观国的“小怜鬓湿胭脂染，只隔粉墙相见”(《杏花天》)；毛滂的“游人莫笑东园小，莫问花多少。一枝半朵恼人肠，无限娉姿媚媚倚斜阳”(《虞美人》)；晁端礼的“名园相倚，初开繁杏，一枝途见”(《水龙吟》)……

可见，对“红杏出墙”的审美关注，早在叶绍翁之前，便已为众多文人词客的诗眼所不约而同地盯上了，简直就像是“大众情人”！包括叶句在内，这其间既有可能后人借鉴了前人的，也完全有可能是没有借鉴而纯粹是各人的原创。因为，“红杏出墙”作为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景观，它不仅是并不罕见的，更是格外引人注目且容易生发联想的。但是，作为“园林六法”之一的“蒔花栽木”(另五法分别为立意构思、掇山理水、亭台楼阁、题名点景、诗情画意)，园林中所栽植的观赏花卉不止于杏花，还有梅花、桃花、牡丹、玉兰、桂花等等，不一而足，为什么诗人们会对“红杏出墙”表现出情有独钟的敏感呢？我的体会，可能是一般园林的围墙高度在2.5米以上，深院高墙有在3米以上的。园内的花卉，如果植株在2.5米以下的如桃花、牡丹等，不可能有出墙的景观，自然也就不可能引发诗人相应的审美敏感；植株在5米上下的如玉兰、桂花等，开放在3米以上，园外人可以一览无遗，当然也不会引人对园内的树干发诗情的联想。只有杏花、梅花，株在3米上下，才偶有出墙的一枝两朵，十分地耀人眼目而引人对墙内繁枝密花的遐想。

一枝两朵，当然显得意境清冷、乍暖还寒；而墙内盛开的如果是杏花，则意境在缤纷热闹；如果是梅花，则意境在疏落高冷。由“一枝红杏出墙来”，联想“满园春色关不住”的芳菲，何等对

比鲜明而且丰富多彩！而由“一枝冰蕊出墙来”，联想“满园彻骨畏高冷”的寒意，不显得多此一举的不尽得体吗？这也是杏花、梅花虽然都有出墙之枝，而诗人的敏感只钟于杏花而不钟于梅花的原因吧？以我的孤陋寡闻，“梅花出墙”的诗句，除钱先生前引的李建勋外，尤以王安石的“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更为著名。其妙处在只专注露出墙角的“数枝”似雪，而不去联想墙内的满树似冰。以李方膺的赏梅经验，“触目横斜千万朵”，尚且“赏心只有两三枝”；既然只见“墙角数枝梅”，又何必去联想园内万斛冰呢？

“红杏出墙”也启发了后世瓷器彩绘装饰的一个创意，这便是“过枝花”。据《饮流斋说瓷》，系创始于明成化时的五彩，但作品颇罕见；盛行于清雍正时的粉彩，传世作品甚多。所谓“过枝花”，是指敞口的盆、盘、碗等器皿的彩绘，使内壁与外壁的花纹枝叶相联的一种构思设计。所描绘的题材有牡丹、菊花、桃花、桃实、海棠、杏花等等。其匠



杏花雏鸡图(国画) 齐白石

这个冬天的气温，一直呈现“过山车”的态势：刚立冬的几天，天降罕见的大雪，气温跌破近几十年同期最低值；没几天，艳阳高照，气温冲高，完全没有冬天的迹象，以至于迎春花开出了金灿灿的小花。行家说，这是典型的春化作用——气温骤降之后再攀升，呆萌的花儿们以为春天到了。类似的景象在12月又发生了两三次，极寒和极暖交替，暖多寒少。冬天，仿佛是个调皮的小孩子，一直和大人玩躲猫猫，偶然露出小脑袋来让大家看看，提醒你们别忘了我，然后又藏起来。这种起伏不由让我想起已经过去的2020—2021年的冬天——和这已经过去的半个冬天如出一辙。

2020年的岁末、2021年初，北京遭遇了“史上最冷”的日子。2020年12月29号前后那几天，最低温度达到-19°C，是同期历史极值——那时候还在“一九”之中。北京应该有过低度的温度，但都出现在一月份的“三九”“四九”当中。几天之后，1月6—8日，寒潮再次袭击我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北京的最低气温再次探底。两次极寒过程，前后一周左右，虽然短暂，但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最冷的天不等于最冷的冬，恰恰相反，那个冬天几乎可以说是最暖的。没过几天我们经历了如春天般温暖的“三九”“四九”和腊月，在还未到正月十五的时候，就又一次遭遇了历史极值：2月20日，北京温度超过20°C！这并不是个孤立事件，那一天全国365个气象站点的最高温度齐齐突破同期极值。在很多城市在2月出现了5月的天气，河

最冷的天和最暖的冬

小黑

北河南部分地区达到30°C。

更早一些的2月2日，我吃惊地发现，办公室窗前的那盆跟随我多年的芦荟冒出了嫩绿的新芽！我惊得跟珠子差点掉出来。当年买来这盆小东西，观察几个春秋之后，我郑重记录下：每年三四月份开花。嫩芽先是层层剑形绿叶包裹中生长出来，然后飞快地长长，不久附着在细细“绿线”上的小芽儿就会开出小小的淡紫色花来。这至少应该是三月份的故事啊！而2021年1月底，嫩芽就悄悄地长出来了。我忧心忡忡地看着它们。植物们不懂得气象记录，它们默默地伫立在光阴中，比我们这些能躲会逃的动物更能体会什么是冷暖交替什么是时光流转。2021年3月中北京就正式进入气象学意义上的春天了，比往年整整提前半个月。

2月16日，陕西汉中武侯祠内的四百多古旱莲提前绽放，“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长期以来，这种珍贵的旱莲都在3月开花。2月中就“吐蕊露芳”，“与立春之后节节攀升的气温有关”；在郑州，12月初棕榈树的树头上长出玉米

穗大小的花苞，泡桐树上月白色的喇叭花已开——棕榈树长出花苞和泡桐树开花分明是每年清明前后才有的物候；上海杭州无锡的梅花提前开放，济南趵突泉的迎春花提前开放……各种媒体都怀着欣喜的心情报道这些新闻，邀约原地过年的人们游园赏春。大人孩子喜气洋洋地行走在反常气候中，欢声笑语穿过屏幕洋溢过来。冬天就这么遭人恨。

天气预报对这些反常气候现象的解释一般都是就事论事，诸如冷空气弱、暖气团强、地面南风、空中暖气流乃至“焚风效应”等，很少论及长期趋势和深层次原因，丝毫不触及是冷暖交替什么是时光流转。和研究气象的朋友聊起各级天气预报系统对气候变化的无视，她说这也难怪他们，天气预报只看环流天气等短期因素，中长期因素很难被纳入系统。

来自科学界的信息告诉我们，地球上的15个气候临界点(这些气候临界点是指全球或区域气候从一种稳定的状态到另外一种稳定的状态，量变引起质

变的关键节点，并且临界点事件是不可逆的)已经被激活9个，分别是北极海冰、格陵兰冰盖、北方针叶林、永久冻土、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亚马逊雨林、暖水珊瑚、西南极冰盖、东南极部分地区，已然过半。气候危机已经切切实实地包围了人类。遗憾的是，这些信息即使能传递下来，真正抵达并且触动公众的概率非常低。甭说公众了，很多科学家都无动于衷呢。为什么形成基于事实的共识如此之难，我很纳闷。这些铁的事实和几十年、上百年的前仆后继的科学探究“藏在深闺人不知”。大家在等待什么？是什么让我们对大自然如此冷漠？

2021年2月美国得州的极寒天气和电力系统中断又给气候怀疑论者提供了口实。一个朋友不断地发冰冻的照片和信息给我，说“气候其实变冷了”“清洁能源有问题”，我简直哭笑不得。七嘴八舌的评说中，大家都选择性忽视了这嘴边的现实：1月上旬，北美大部分地区明显变暖，部分地区平均气温比常年同期偏高超过10°C！为什么这几个冬天会出现极寒天气，专家们已经作了很多

解释：原因是作为地球重要气候调节器的北极，它的海冰面积连年大范围消减，冰川大幅度退缩，无法将极涡约束在北极地带了，这些“小家伙”就任性地放飞自我了，不断南下——气候变化已经不仅仅呈现简单的变暖迹象了，而是发展为厚重的极端天气事件和混乱交替的四季状态。不仅风机被冻住了，所有的发电设施在极端天气下都出现了严重障碍。

大多数时间里人们生活在人工环境中，远离自然，于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不论是“气候变暖”(climate change)，还是“气候危机”(climate crisis or climate emergency)，抑或是“气候灾难”(climate catastrophe)，甚至“气候分裂”(climate breakdown)，无论词汇如何变着法儿升级，大多数人们都无动于衷，对春天的提前到来欢欣鼓舞，对即将到来的酷热漫长夏天安之若素——反正有空调嘛。

刚刚去世的伟大博物学家爱德华·O.威尔逊说，人类应当把地球表面的一半交还给大自然，只有这样未来才有希望。但人类的野心何止是“半个地球”。人类飞行器终于前仆后继地抵达火星了，完美着陆，开始寻找生命痕迹。如果火星上真的曾经有生命，那也是数十亿年前的场景了。他们或许就毁灭于贪欲自私和无视真相。迄今火星是唯一还在承载生命的星球，周而复始，或许火星的现在就是它的未来。

朱金顺先生是新文学史科学家，其《新文学资料引论》(1986)为新文学史科学的奠基之作。他曾和长于新文学史科学研究的文学史家丁景唐(1920—2017)先生交往五十余年，年幼十六岁，二人可谓名副其实的忘年交。上海的书刊收藏家、作家韦泱2009年在《像壁一面亦不妨》(收入随笔集《纸墨寿于金石》)一文中写道：“五六年前，曾听现代文学史家丁景唐先生讲，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有‘三个小朋友’，当年他们都还是二十出头的愣小伙。一个是北京大学的孙玉石先生，专事鲁迅研究……第二个是中山大学的李伟江先生，因研究‘左联’五烈士之一的冯铿作品，而受到了丁先生的鼓励，走上了史料研究之路……第三个便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朱金顺先生。当年这‘三个小朋友’，才是丁先生真正的‘入室弟子’。”

2021年北京夏秋季多雨。国庆假期中一个雨天的上午，我去朱先生家，听他讲述与丁先生的交往。他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几摞丁先生有代表性的赠书和赠字，边展示边回忆往事。

1959年，朱先生刚从北师大中文系毕业的时候，逛王府井新华书店，买到《瞿秋白著译系年目录》一书，记住了作者丁景唐先生的名字。后来在报刊阅览室读《文汇报》，常看见他的短文，多关于鲁迅和瞿秋白的。大概在1962年，他冒冒失失地给丁先生写信，请教问题，但不记得问了什么。丁先生在“文革”前的二三百封来信今已不存，不过他所送的书籍留了下来。给丁先生写头封短信过后，就收到丁先生与瞿光照合编的《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这是他送朱先生的第一本书。扉页上有毛笔竖写的题词：

尽是工作与兴奋，
每夜是红花的梦影！
右录殷夫烈士诗片，题赠
金顺同志

丁景唐 六二年十月
时隔不久，丁先生来京参加文化厅局长会议。那会儿朱先生并不知道他的行政职务。丁先生来京后，住在东单一个招待所里。他给朱先生写信，告知他到北京了，问哪天有时间，一起去见瞿秋白的遗孀杨之华。朱先生过去也。杨之华住在南池子的一个大院里。给朱先生介绍了以后，丁先生和杨之华两人开始用上海话交谈，朱先生听不懂。前几年，丁先生三女丁言昭为了给父亲写信，曾打电话问朱先生那次她父亲跟杨之华谈了什么。他说当时自己就听懂了一句。杨之华问丁先生家有几个孩子，丁先生说有六个。杨之华说：“老米都被你们家吃了。”两人哈哈大笑。

第二天，丁先生让朱先生带他去逛东安市场的旧书店。朱先生那天还带了一本书，作为对丁先生送《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的回赠。他有两本鲁迅译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未名社版的毛边本十分漂亮，他拣了一册初版本给了丁先生。二人从此成为忘年交。

1963年，有一件令朱先生难忘的事儿。丁先生给他来信，请他去北京图书馆，替他抄写殷夫的未刊诗集《孩儿塔》。诗集在左联五烈士的一包文稿里，这包东西先是保存于鲁迅先生家，新中国成立后，许广平把它交给在人民出版社负责编辑鲁迅著作的冯雪峰，冯雪峰用完后，又把这些文物转交北京图书馆。其中的《孩儿塔》手稿是编好了的诗集，而且有署名白波的八幅插图。从1949年到当时，出版过四种殷夫诗选集，除了开明书店版《殷夫选集》未选《孩儿塔》中的作品外，其他几种或多或少地选了一些，然而还有三十首诗没有公开发表过。《孩儿塔》主要是爱情诗，是殷夫成为革命者以前的诗，对认识作者的心路历程很重要。丁先生让朱先生给他抄那三十首诗。原件在位于天津街的北京图书馆特藏部，这个部门收藏了一些宋版书、名人手稿等，该馆的宝贝都在此处。那时候朱先生刚毕业当助教，当时别说了助教了，就是教授也进不去。丁先生时任上海市出版局副局长，他业余研究鲁迅、瞿秋白和左联五烈士。这

朱金顺与丁景唐的忘年交
黄开发

书缘

一次，朱先生手持上海方面的介绍信，不仅完成了任务，还通读了那一大包手稿，收获颇丰。朱先生后来写了论文《殷夫(孩儿塔)中的爱情诗》，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第一期。

两位先生居住京沪两地，见面不多，一辈子大概有六七次，多数又是在开会的时候。正式见面有三次，两次是在朱家，其中一次是“四人帮”倒台后。丁先生那时担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党委书记，曾到中央党校学习了半年，是丁言昭陪着他爸爸来的，后来他老伴儿王汉玉女士也来了。

丁先生“文革”后给朱先生的信也有二三百封。他“文革”以前的信都是用毛笔写的，到了新时期改用钢笔。他还赠送朱先生和夫人龚肇兰女士好几幅字。朱先生给我展示了三幅：一是1989年2月祝贺新春，字是“书海求珠”，右上角钤闲章“桃花潭水深千尺”；二是1996年钱君匋为丁先生刻鲁迅语“纸墨更寿于金石”。丁先生从事行政工作，业余做学问，应该是个大忙人，然而与晚辈的朋友交往，忙中偷闲，毫不苟且，实在让人感佩。从他的身上，也可以看到受鲁迅等民国文人影响的趣味。

五十多年里，丁先生送朱先生的书至少有五六百本。他自己的书每本都送，还有他自己编的、别人送给他的、他自己买的。为上海鲁迅纪念馆建“丁景唐文库”整理书的时候，他还找出三四本寄过来。朱先生那次去看望来北京学习的丁先生，受赠越丹的《地狱之门》，这是丁先生给越丹出的。扉页上有赠书人的题词——
金顺、肇兰同志留念

一九八〇年十月七日，余自中央党校赴北京医院，与阿丹同志作“一分钟”会见，越三日，越丹同志去世。今持赠自书，以为纪念。

景唐、汉玉、言昭
一九八〇年十月十九日于北京
署名上面钤有丁先生的印章。此前，朱先生还收到了丁先生的《学习鲁迅作品的札记》。这是丁先生到了上海文艺出版社以后出的第一本书，自造的毛边本，盖了很多图章。此书大概是新时期以降最早的毛边书之一了。1995年6月，丁先生最后一次到京，参加瞿秋白纪念会，会后专程到北师大朱先生家，赠送了他自己编的《陶晶孙选集》。在给朱先生的最后几本赠书中，有一册上海鲁迅纪念馆编的《六十纪程(1951—2011)》，丁先生与该馆关系密切。他的赠书题词2001年2月写于上海华东医院。书是托韦泱邮寄的。衬页背面还粘有一张他写的淡黄色的便利贴，说他每周都去华东医院看望丁先生一次，顺便代老人做些复印、邮寄之类的事情。

回忆与丁先生的交往，朱先生颇生感慨，动情地说：“我有事儿求他帮忙，他都做；他让我给他做的，我也给他做。我们俩是这种交往。他曾赠送给我一幅字叫‘书缘’，我们俩就是因书结缘的。”他还说：“我是从一开始就拿丁先生当老师对待的，从称呼上就知道。我们那个年代，跟教过自己的或者没教过自己的老师都称‘先生’。除此之外，平常交往，不论老少，都统称‘同志’。我开始就称丁先生，一辈子都称丁先生。那时候教过我们的老师像李长之，我们就称‘李先生’。”

丁言昭写《丁景唐传》时，曾给朱先生打电话，说她拟写“三个小朋友”一章，提出借阅丁先生给朱先生的信件。保存下来的信件有几百封，朱先生那时得了一场大病，刚从医院回家调养，体质甚弱，没有精力去翻阅，未能满足丁女士的请求。后来梓行的《丁景唐传》可能是因为资料受限，没有这一章。我觉得这是一个遗憾，丁先生与三个“小朋友”交往，提携后学，高风亮节，颇能够反映出丁先生人格的光辉。

2021年11月13日

